

中原时评

■个论

王案尘埃落定,聂案再审何时重启?

9月27日,河北省高院二审宣判王书金涉嫌强奸、故意杀人案,驳回上诉,维持一审判决,不认定王书金是聂树斌案真凶。如今看来,王书金案尘埃落定——只待最高法的死刑复核。聂树斌母亲在宣判后呼吁最高法复核时“刀下留人”,并启动聂案再审。(9月28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王书金案这么多年来,之所以备受关注,正是因为和那个真相至今扑朔迷离的聂案之间,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。王书金案尘埃落定,聂案再审何时重启?现在就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。

聂母的代理律师说,7年来,聂家一直向河北省高院申诉,要求再审聂树斌案,但至今毫无进展。律师曾多次要求查阅聂树斌案的卷宗材料,而每一次都遭到拒绝。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。

此事更令人费解之处在于,王书金自归案以来,多次供认自己是聂案的凶手,但是检方却一直极力否认这一点。本次宣判之后,王书金律师表示,“王书金不服裁定结果”,再次表示“我干的就是我干的,你不能让别人背黑锅,这不公平”。凶手“自承其罪”,而检方却似乎唯恐其罪名坐

实,不遗余力,力证其“无罪”,这一中国控辩史上难得一见的奇景,竟然持续了六七年。

当然,从“疑罪从无、无罪推定”的角度说,关于1994年8月石家庄西郊强奸、故意杀人一案,因“一些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”,所以法院最终裁定,王书金并非此案元凶,这符合现代法治精神,本是无可指摘的。

可这只是剥离了特定语境的就事论事。王书金犯案累累,依法当诛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公共舆论眼中的王书金案,其焦点不在于早已认定的王之前背负的几宗命案,而是与聂树斌案出现交叉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。

正如聂母所言:“要说王书金不是凶手,那么聂树斌更不应该是凶手。”至少要承认这种可能性,王书金如真不是凶手,聂树斌也可能不是凶手——那么,聂案更有重启再审的必要。王书金案的判定,并不能阻碍聂案再审的重启。换句话说,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。

几年前王书金的供述,让聂案有了“一案两凶”的合理怀疑,甚至让聂案成了“冤假错案”的代名词。毕竟,从动机上论,王根本没有假冒该案凶手的理由。

而检方一直抓住不放的如“被害人衣着、身高、作案时间”等细节,也可能由于时间久远或个人记忆混乱等因素出现偏差。何况,检方出示的一些关键证据,也是复印件而非原件,这些是否也给人留下了合理怀疑的空间?

真相不能永远在路上。迟到的正义,有时就是非正义。聂母的代理律师,多年要求查阅聂案卷宗,为何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答复?彻查此案的民意舆情,更是沸腾多年,却也一直未得到官方的首肯。

当年此案主要就是根据口供定案,而这必然存在瑕疵。以今日观点来看,就是关键证据不足。如果王书金都能疑罪从无,那聂树斌自然也该享同等司法待遇。因为,定罪标准永远只能是证据而非其他。聂的死亡,不应影响再审程序的启动。

而假如重启调查,最好能异地审理。否则如贺卫方教授所说,当地检方因自身利害而放弃职守,“被告在法庭费尽心力要求追究他的未被追究的犯罪,检察官却千方百计证明那不是被告所犯之罪”,律师跟检方角色“乾坤大腾挪”的尴尬,或许还会重演。

□李晓亮

■街谈

饭菜可以打包,厕纸还是免了吧

作为城市文明缩影的公厕,深圳市政府加大投入力度,将公园厕纸纳入政府采购范畴,提供免费厕纸。记者在走访中发现,免费厕纸遭遇浪费严重的现象。如厕市民取纸,几乎无一例外都要取约一米长,如厕后洗手要再拽一大截,更有甚者,临走时还扯上很长一截塞进包里带走。(9月28日《深圳晚报》)

城市公厕提供免费厕纸,不但可以解决个别市民遇到内急却没有随身带手纸的尴尬与难堪,而且也体现了城市管理上的人性化,带给广大市民、游客的是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温暖与感动。但是这一“厕纸免费”制度,在帮助很多人避免了尴尬的同时,自己却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。原因其实很简单,就是很多如厕者大量浪费厕纸,更有甚者自己用完了还不算,临走的时候还要扯上一大截“打包”。

在外面吃饭的时候,剩饭剩菜打包带走是个好习惯,但是厕纸“打包”就免了吧。毕竟自己的剩饭剩菜,是自己花钱买的,有权利打包带走;如果不打包带走,别人也无法再食用,就会造成资源浪费。但是城市公厕的厕纸,是由公厕管理方提供的,不是市民的私有财产,随意带走,不但可能会造成别人没有厕纸可用,说得严重点,还有侵吞公共财物之嫌。

城市公厕向如厕者提供免费厕纸,既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,也体现了城市管理者的人性化服务理念,那么作为广大市民、游

客,理应珍惜这样的文明与进步,感念于这样的人性化服务,并且通过自身的行动予以积极的配合,让这样的文明与进步更多些,让这样的人性化服务措施在更多的方面和领域得到体现。

反之,如果因为贪占一截厕纸的便宜,让这一“厕纸免费”政策无以为继,导致管理者不得不取消这一人性化服务举措,这不但是社会缺乏文明的表现,而且也是对文明与进步的一种阻碍。而且,这样好的政策取消了,利益受损的是所有人,肯定包括那些当初肆意浪费厕纸,甚至是“打包”带走厕纸的人。

所以说,根本的解决办法,是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文明素质和文明水平,提高社会的整体文明与道德水平。当然了,这一目标的实现,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不可能一蹴而就,那么在此之前,我们又该怎么做?这就需要从城市公厕的管理水平和智慧上入手了。比如有的地方的公厕采用了“节纸器”,设置取纸的间隔时间,如果一个人取纸,按完了觉得不够,要再等一两秒钟后再按,才可以再出一段。也有网友建议,免费厕纸采取份数计量,让每位如厕的人定量用纸,同时在厕纸上印刷免费厕纸的图案、标志,防止被人带走,等等。

应该说,这些办法,作为国民整体文明素质提高之前的一种“权宜之计”,还是有其现实价值和意义的,值得有关方面思考与借鉴。

□苑广阔

■个论

司机替代临时工成为新的“替罪羊”?

日前,广州市机关作风“曝光台”(第四期)出炉,又曝光4个部门有人上班期间看视频、玩游戏、看股市。9月27日,有关部门对涉事人员身份的回应中,“司机”“外聘人员”再度出现。(9月28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上班玩游戏是“司机干的”,这似乎已成了某些部门的“标准答案”。今年7月中旬媒体报道称,广州市纪委在市委礼堂大厅以活动公告板的形式,公开曝光了通过网络监控抓取的市属机关工作人员上班期间看视频、玩游戏、看股市等“庸懒散奢”行为。记者对被曝光的11个机关单位逐个采访核实,其中7个回应“不务正业”者是司机。

“司机干的”为何成了“标准答案”?这恐怕有两种情况。

一种情况是,确实有些玩游戏的就是司机。那么,人们就会追问,司机怎么闲得没事干?这说明,机关里配的公车太多了,超过了实际需要;也说明司机太多了,需要精简掉一些司机。事实也正是这样:据一些基

层纪检干部介绍,公车按机关干部人数配备,有些单位外勤少,常常一整天都没有出车任务。广州去年以来加大力度整治公车私用,推行一年多,全市公车行驶里程比实施前减少了45%。行驶里程减了一半,公车、司机一个没动,能不闲吗?也有当地公务员透露,处长以下的公务员外出办事都是自己开车,机关单位的司机一般只给领导开车,常常就是接送领导上下班,然后全天就在单位待着。由此看来,真的需要从源头上减少公车数量,同时相应减少司机数量。

另一种情况是,上班看视频、玩游戏、看股市的不全是司机,也有机关干部。这里使用的依旧是“临时工”策略,拿司机去顶责呢。这里也有两个问题:一是,上班看视频、玩游戏、看股市的公务员,是不是耽误了工作?如果公务员玩得连工作都丢在一旁,这样的公务员应该受到处分,并且影响考评;如果上班看视频、玩游戏、看股市没有影响工作,则说明该公务员的岗位职责太少,没有什么具

体工作任务,也可以和其他岗位合并,撤销或减少一定的岗位。总之,上班看视频、玩游戏、看股市,再次见证了这些机关干部的人浮于事。

此外还有一个问题。既然上次发生问题就用“司机干的”来回答,已经受到批评,现在怎么还拿这个答案回答?“司机”们岂不是屡教不改?要知道,现在不管是暗访还是监控,都是“有图有真相”的,是不是司机或者临时工,“对号入座”只是简单的技术问题。这就说明,作风涣散的背后,必然有深层次的问题——机关存在人浮于事的惯性问题,“批评教育”“责令检讨”对这些“赋闲”人员来说,已经产生不了好的效果。所以,对于那些经常发生上班玩游戏的单位和部门,刚性采取减少编制、裁撤人员的举措,是为必须。

记得诸葛亮用“空城计”吓退司马懿,金圣叹批注说“此计不可再用”。司机替代临时工成为新的“替罪羊”,值得相关方面深思。

□殷国安

■街谈

“爱心馒头”仅是公共救助的补充

始于2012年9月份的河北省南宫市爱心馒头店,伴随爱心的逐步扩展,悄然走过四季更替。一年间,送出的爱心馒头逐日递增,义工数量将趋稳定,规章制度日益完善,奉献爱心蔚然成风。“看到爱心在扩散,我心里感到很欣慰。”26日上午,南宫市爱心馒头店创始人贾秀英告诉记者。(9月28日《燕赵都市报》)

常言道: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”。然而,在河北省南宫市却出现了专为老弱孤寡和困难群众免费提供馒头的“爱心馒头店”,而且持续了12个月,共投资21.8万元,做了8.4万斤面的馒头,送出馒头51.8万个,受益人数达到12.9万人次。显然,这又是由民间人士发起的一次“施粥”式的慈善行动。在中国,“施粥”虽然是一种世代相传的民间慈善行为,但在当今社会,却已经比较鲜见。可见,这家“爱心馒头店”之所以会令众多网友感动,是因为传承和引领着一种久违的民间慈善精神。

对于这种难得的“爱心馒头”,我们非但不应该去恣意挥霍,反而应该给予精心呵护和爱心接力。特别是,虽然我们不能再期待这种“爱心馒头”能够惠及所有的社会弱势群体;也不能奢望这种民间慈善行动能够持续多久。但我们理由相信,通过这种民间慈善行动,能够给地方政府及公职人员一个善意的提

醒,甚至能够倒逼政府公共救助机制,在“施粥”式的公共服务上更有作为。

因此,我们希望政府公职人员都来尝一尝“爱心馒头”,不是为了争抢这有限的“公益蛋糕”,也不是“忆苦思甜”,而是为了感受一下民间慈善的力量和温情,体验一下社会弱势群体的困难和艰辛,让他们养尊处优惯了的身心得到一次洗礼。也许,吃了一个“爱心馒头”,会让他们变得更清醒、更理智,并对过去毫无节制的“三公消费”进行深刻反思,从而打消公款享受更多职务消费的念头,并管好自己这张吃过的“爱心馒头”的嘴,把原本用于公款吃喝的资金节省下来,去为民间的慈善事业添一个“馒头”。

可见,“爱心馒头”仅是公共救助的一种补充。完善社会保障救助机制,化解公众隐忧和焦虑,已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。要知道,“施粥”式的公共服务,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。因此,政府需要加大投入,建立和完善必要的救助措施,专门救助那些失劳或失能的人群。同时,应总结民间慈善的成功经验,社会救助必须走社会化的道路,多元化筹集资金,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,并为公众的慈善行为提供一个正常的通道,使更多的“爱心馒头”能够温暖真正需要救助的人群。 □张西流